

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村政治动员思想的形成

李汉卿^{1,2}

摘要

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革命获得了全国政权。在如此长的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的农村政治动员思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该思想的形成是中共党人和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探索的结果。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失败成为毛泽东转向农村的时代背景，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则是毛泽东农村政治动员思想的发轫。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特别是在《论持久战》的演讲中明确提出对农民的政治动员标志着农村政治动员思想的形成。毛泽东农村政治动员思想的内核是阶级斗争，它也成了1949年后中共治理国家的重要政治遗产。进入新时代，中共中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若实现此目标，中共党人就需要对毛泽东的农村政治动员思想进行反思。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农村政治动员；阶级斗争

I. 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城市（上海），最初的党员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属于城市精英。然而，它却领导中国农民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开创了独特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动员起数以千百万计的农民，使他们卷入到革命大潮中，而成为革命的主力军。这是20世纪中国政治不可忽视的事实。但是中共成立之初并没有直接采取农村策略，而是效仿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发动城市暴动，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大革命失败之后，以彭湃、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开辟了农村革命的先河，前者尝试建立了最早的苏维埃政权，而后者则发展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所以说，中共转向农村既反映了它的策略转移，又表现出了它在革命实践中的逐步成熟。它日益成熟的表现之一就是动员农民的能力在战争

中得以逐步提升。中共实施“农村包围城市”策略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农村政治动员思想发挥了战略性作用。

然而，学界对于毛泽东农村政治动员思想的形成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从既有研究看，学者们关于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改革中的政治动员³以及革命动员⁴、会议动员⁵，关于毛泽东政治动员思想的研究则主要体现为政治动员思想的内涵⁶、策略⁷、历史考察⁸及其当代启示⁹，而对于毛泽东农村政治动员思想的形成鲜有提及。因此，本文就试图借助中共革命时期（1921～1949年）的历史分析，来描绘毛泽东农村政治动员思想的形成过程。

II. 毛泽东农村政治动员思想产生的背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失败

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且在共产国际帮助下

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俄为师”，不仅强调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主张以工人运动求得解放，而且还效仿苏俄“城市包围农村”的革命道路。所以，确切地讲，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是俄国化（列宁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是经过苏俄（联）共产党解释的马克思主义。¹⁰然而，在俄中两国国情迥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人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教育工人，通过工人运动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共产党初创期，农民阶级并没有被看作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而是工人阶级的友军（这里的农民专指佃农）。¹²例如中共一大制定了如此的党纲：（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¹¹同时，还制定了工人运动的基本策略：成立产业工会、通过出版物宣传党的政策、成立工人学校教育工人以及成立研究工人运动的研究机构。¹⁴北京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共一大上做的报告中也总结了工人运动的经验：第一步，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第三，提醒他们时刻不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最后，第四，我们必须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¹⁵可以看出，中共成立早期就很重视政治动员的手段与方法。正是在上述策略的指引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在一年的时间内，上海地区就进行了六次罢工、联系了五处工会并参加工人群众运动五次。¹²在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工人运动开始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了第一次高潮，持续时间长达13个月。在此期间爆发的罢工有100余次，参与人数多达30多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党组织或中共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直接发动的。

在这次罢工潮中，以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1922年1月12日），牵涉铁路、矿业等行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2年9月14日）、开滦五矿大罢工（1922年10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3年2月4日）等。其中除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曾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外，其余的罢工均遭到了帝国主义和当地军阀势力的残酷镇压而以失败告终。¹³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所以选择工人运动为其主要的革命道路，是因为照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俄国革命的某些经验，忽视了中国国情。例如，《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曾言，“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笔者注）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阶级争斗就是打倒资本主义的工具。共产党的任务是要组织和集中这阶级争斗的势力，使那攻打资本主义的势力日益雄厚。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产业组合定要用大罢工的方法，不断的扰乱资本家的国家，使劳动群众的敌人日趋软弱。要是到了可以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政权的最后斗争的时机，由共产党的号召，宣布总同盟罢工，这就是给资本主义制度一个致命的打击。并且当资本家被打倒了之后，这些产业组合就变成了共产主义的社会中主管经济生命的机关。”¹⁶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的共产党员这时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考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¹⁷

1922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对于目前实际问题的计划》指出，在中国工人阶级中，铁路工人、海员、矿工是“三个有力的分子”，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要先成立这三个产业的联合组织，作为工会运动的中坚。因而，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就出现在铁路、海员和矿业行业。尽管这三个行业的工人人数相对较多，

但是这些重要行业均被帝国主义势力及其代表——封建军阀控制，加之工人中中共党员人数较少，难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因此而致工人运动失败。应该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人运动是在城市范围内试图以和平斗争的方式取得工人、农民及被压迫人们的解放。然而，这一段曲折的革命实践，促使了一部分中共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开始转向农民且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曾经对这一段历史做过比较中肯地评价，他在1958年6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上对此件（《中国共产党宣言》，笔者注）作了如下的批语：“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¹⁴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8]

III. 毛泽东农村政治动员思想的发轫：《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

将社会大众划分为若干个阶级是马克思阶级分析法的具体体现。早期的中共领导人经常采用阶级分析法来寻找革命的力量与道路。他们中间比较早的是陈独秀。陈独秀曾经在1923年相继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9]、《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0]两篇文章，分析了当时的社会阶级。

在第一篇文章中，陈独秀把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三种：“一是革命的资产阶级，如中国海外侨商及长江新兴工商业家之一部分；二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也可以叫做官僚的资产阶级，如中国新旧交通系之类。自盛宣怀以至张弧王克敏，乃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三是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他们是小工商业家，在小资产阶级的中国社会居最大多数。”^[11]同时，提出在军阀阶级与资产阶级已显然分开而资产

阶级与无产阶级尚未截然分离的情况下，担负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命的中国国民党，应该“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革命”^[12]。

在第二篇文章中，陈独秀进一步把当时中国的社会阶级分成幼稚的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农民以及工人阶级等。他认为：幼稚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是动摇不定的，可以争取他们参加革命；官僚资产阶级是反革命的；居于中国大多数的松散的农民一旦组织起来将成为国民革命的一大动力，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工人阶级有着自己阶级的特殊利害，但是还不能成为一股独立的革命势力。可以说，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已经明确提出了除官僚资产阶级之外都是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革命力量，都是国民革命联合与团结的对象，更进一步指出包括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的国民革命是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

这两篇文章撰写的时代背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以组成革命统一战线。刚刚成立两年的中国共产党力量还很幼小，从而也受共产国际的控制。¹⁵作为中共领导人的陈独秀有责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在工人运动前景暗淡的情景下，撰写相关文章为建立联合革命战线鼓吹。这既反映了陈独秀与反革命势力不妥协的立场，也表现出他对于进行一场完全而又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期待。然而，囿于时代的限制，陈独秀在这两篇文章里只是粗线条地勾勒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而没有对各阶级进行细致分析，也没有阐明如何促使各阶级联合起来进行国民革命。同时，他虽然强调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但是也明白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可以说，在第二篇文章中，陈独秀陷入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教条，即先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教条。陈独秀的美好愿望，很快就因孙中山的逝去和蒋介石的掌权而归于破灭。以“四·一二”政变为标志的国共合作统

一战线的破裂，正式宣告了共产国际路线的失败，也推动了国共两党的深刻反思。

在早期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比其他人更为深刻。一方面是因为他较少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他的工作主要在基层。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¹⁶一文，全面剖析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并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当时党内存在着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13]

在文中，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对当时的中国各个阶级进行了分析。¹⁷他认为，各阶级的革命态度是由它的经济地位决定的。依照此标准，毛泽东将社会各阶级分析如下：

1.大资产阶级。包括买办阶级（与外资有密切关系之银行家、商业家、工业家）、大地主（如张作霖、陈恭受等）、官僚（如孙宝琦、颜惠庆等）、军阀（如张作霖、曹琨等）。他们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他们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不出一百万，即四万万人口中之一，乃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

2.中产阶级。如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因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本国资本银行工商业的发展尚限在中产阶级地位。所谓银行业乃指小银行及钱庄，工业乃指小规模工厂，商业乃指国货商。凡是大规模银行工商业无不与外资有关，只能算入买办阶级内。）、小地主、许多高等知识分子——华资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个阶级的欲望为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然受外资打击军阀

压迫不能发展。这个阶级对于民族革命乃取了矛盾的态度。即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革命的运动。但因现在的革命运动，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发展及存在，感觉着威胁，又怀疑革命。这个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其政治的主张为国家主义——实现民族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产阶级的人数，在全国内至多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百分之一），即四百万人。

3.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合计达一万万五千万。这个阶级虽同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时有三个不同的部份。第一部份是富裕阶层。他们的经济地位与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革命亦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大概不及小资产阶级全数百分之十，约一千五百万，乃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恰足自给的。随着近年帝国主义军阀大中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使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但他们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大概要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百分之五十），即七千五百万。第三部分是每年要亏本的。这一部分人，大概原本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饱等，渐渐变得要亏本了。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动革命的力量。其人数约占小资产阶级中百分之四十，即六千万——一个不小的群众，乃小资产阶级的左派。以上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份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一定参加革命；中派可以参加革命；即使右派份子，受了无产阶级及小资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

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们从五卅运动和两年来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错的。

4.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乃包含半自耕农、半益农¹⁸、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之六种。半自耕农的数目,在中国农民阶级中大概占五千万,半益农贫农大概各占六千万,三种共计一万七千万,乃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这三种农民虽同属半无产阶级,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由于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故半自耕农之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半益农;半益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以及相当数目之流动资本,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既无固定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本,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手工业工人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因其经济地位略与农业半益农相当。店员乃小商人的雇员,其地位与手工业工人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地位与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手工业工人人数大概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即二千四百万人,店员大概有五百万,小贩大概有一百万,合起半自耕农、半益农、佃农人数、半无产阶级人数共计约二万万,占全人口之半。

5.无产阶级。其种类及人数主要有: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都市苦力——约三百万、农业无产阶级——约二千万、游民无产阶级——约二千万,共约四千五百万。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主要集中在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而大多数在外资产业之下,就成为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还受着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经济地位与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其有组织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中国的农业无产阶级,乃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他们在乡村中乃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与贫农处于同样紧要的地位。游民无产阶级为失了土地的农人与失了工作机会的工人,其人数在二千万以上,他们乃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问题。中国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贫乏,另一个是失业,故若解决了失业问题,就算是解决了中国问题的一半。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当时中国各阶级的类型、数量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可以用表1表示。

表1 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类型、
数量及其对革命的态度

阶级		人数	对于革命的态度
大资产阶级 ¹⁹		一百万	极端反革命
中产阶级		四百万	右翼邻近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但易与敌人妥协。全体看来都是半反革命。
小资产阶级	富裕部份—右翼	一千五百万	平时近似中产阶级之半反革命。战时可附和革命。
	自足部份—中央	七千五百万	平时中立，战时参加。
	不足部份	六千万	欢迎
		共一千万五千万	
半无产阶级	半自耕农	五千万	参加
	半益农	六千万	积极参加
	贫农	六千万	勇敢奋斗
	手工业工人	二千四百万	同半益农
	店员	五百万	同手工业工人
	小贩	一百万	同贫农
		共二万万	
无产阶级	工业无产阶级	二百万	主力军
	都市苦力	三百万	次于工业无产阶级的主力军
	农业无产阶级	二千万	勇敢奋斗
	游民无产阶级	二千万	可引导为革命的力量
		共四千万五百万	

资料来源：转引自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1日），<http://dx.njucm.edu.cn/2016/0511/c2834a19632/page.htm>。

在文中最后部分，毛泽东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他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派知识阶级即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作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时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我们真正的朋友有多少？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我们的真正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这一铺唾沫。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团结起来呀！”²⁰

毛泽东是全面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对革命的态度第一人。他不仅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工业无产阶级，还找到了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农民阶级。尽管此篇文章写于1925年大革命高潮时期，但是毛泽东已经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1927年所发生的“四·一二事变”就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这篇文章是中国革命的指明灯，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力量以及动员这些力量的方式（改善和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的抉择关头，毛泽东选择了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地区进发，开辟农村根据地，走出了与苏俄“城市武装暴动”不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IV. 毛泽东农村政治动员思想的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提出

中共成立的早期，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其实并没有一致的意见。由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知识、经历以及所处的环境，他们不可能形成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统一意见。李大钊和陈独秀不仅形成两个地方派系，而且对于工人和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的看法也大相径庭。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主张工人运动，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方式；同样不接受农民能在改造中国社会中充当领导的想法；而李大钊则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约束，为了寻找一条使知识分子接近社会生活的具体路径，他第一次把自己的目光直接转向农民。^[14]

在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构想中，无论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农民的地位和作用都是相当模糊不清的。^[15]陈独秀是带着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因而，他无法理解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最落后的这部分社会力量（被传统牢牢束缚的农民）竟能在社会改造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像诸多的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认为，政治上落后的乡村必然要依附于先进的城市，城市无产阶级和城市资产阶级将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主宰力量。^[16]基于此，陈独秀并未把农民看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瞿秋白与陈独秀一样，都把城市资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看作是社会革命中仅有的两支社会势力，他们都把城市无产阶级看作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动力和领导者。^[17]

虽说如此，在早期的中共文（章）件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农民问题的主张。最早的是1920年底发表于《共产党》月刊的《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在此文中公开号召农民“自己动手”，“抢回”自己“靠着吃饭的田地”，并说共产主义者一定支持他们的要求。同时还号召：“同志们呀！我们要设法向田间去，促进他们的这种自觉呀！”^[18]1921年7月中共一大制

定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正式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19]与此同时，一些中国共产党员和它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某些地方发动了农民运动和减息运动，并成立了农民协会等组织。²¹

中共二大的大会宣言中第一次分析了农村的阶级，指出它包括“富足的农民和地主、独立耕种的小农和佃户和农业雇工，其中小农、佃户和雇工占农民总数的95%，他们要解除穷困和痛苦，必须与工人握手进行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20]1923年“二七惨案”的发生，使早期共产党人认识到单靠工人阶级的力量难以取得革命的胜利，推动了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的认识。该年11月，陈独秀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一文，进一步阐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认为“人数超过一万万二千万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21]1923年，陈独秀相继发表了《中国农民问题》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文，重申了农民力量之大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但不足之处是过分夸大了农民的弱点与不足。邓中夏在《本团应注意农民运动》、《论农民运动》等文章中，在肯定海丰、衡山两地的农民运动并认为他们丝毫不逊于工人运动的同时，还提出无产阶级要注意农民运动，“农民至少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中国不革命则已，欲革命我们不教育，煽动，领导这占人口大多数之农民积极的参加，那有希望。所以我们现在要积极分出精力来做农民运动，是不该有疑问的，是必须充分了解的”^[22]。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依照正统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道路的共产党人，尽管在各种因素的交织下开始重视农民的力量，但是始终没有将其作为革命的中心力量，而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毛泽东担任中共的主要领导者。出现此种

情况，除了领导者个人的认识之外，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也是重要因素。正像斯图尔特·施拉姆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政策始终服从于斯大林的错误理论，斯大林最关心的是维护同国民党结成的统一战线，那些表面上似乎激进的政策完全被他们在国民党的权威下订立的契约所限制。斯大林公开发布命令，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党，而且这个党在农民运动中至少占有名义上的优势。这意味着共产国际代表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必须注意防止农民采取过于激进的行动促进农民革命，破坏统一战线。”^[23]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前，农民运动是一种零散的、自发的、以个别人物领导为主的，还未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的统一政策，亦不是党的有组织行动。尽管中共早期的农民运动是以个别人物领导为主的，但是他们之间的思想有着承继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陈独秀与邓中夏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关于中国农民的阐述也对毛泽东农村政治动员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然而，发挥了更为关键作用的则是李大钊以及澎湃两人。李大钊在1918年冬至1919年春，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则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将澎湃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割据政权的思想总结并发扬光大，进而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23]

与陈独秀等人不同，李大钊很早就关注农村。早在1919年2月，李大钊就在《晨报》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认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因此城市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去‘开发农村’，使‘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24]实际上，文章中已经隐含着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成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正确认识的先导。毛泽东十年后则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的论断。

1925年12月30日至1926年2月3日，李大钊在北京党组织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上》

发表了长文《土地与农民》。^[24]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25]这体现出他试图把农民革命的力量看作是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他还很重视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若想提高贫农的地位，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26]此外，李大钊还号召“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如哥老会、红枪会等旧时的农民组织，笔者注），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随着乡间的组织工作，当注意到乡间的文化提高问题。到乡间去的同志们，应知利用农闲时间，尤其是旧历新年一个月的时间，作种种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为使此项工作多生效果，图画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均须预备；并须要联合乡村中的蒙学教师，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27]

到了1925年底，在中国共产党内，对农民的革命潜力发生兴趣的，除了李大钊之外，澎湃在广东进行了组织农民运动的尝试，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还有毛泽东（先前的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他于1925年初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其故乡湖南组织了农民协会。“到了1926年，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农民暴动，农民运动走向了高涨，它已经成为共产党战略、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党内引起争论。尽管大多数共产党员都不否认农民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着某些作用，但是对于如何估价这种作用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28]

毛泽东是将外国的理论与中国实际融合最为成功的人。毛泽东的农村政治动员思想的形

成大致上分为大革命时期以及大革命失败后时期。

一是大革命时期。大革命阶段，特别是1925-1927年三年间是毛泽东确立农民是革命中心的思想的时期。尽管毛泽东在1925年才开始从事农民运动²⁵，但是李大钊的思想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他。早期的毛泽东在长沙、安源等地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及以后，毛泽东陆续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论持久战》等文章或演讲，这些著作不仅强调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开创了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还提出了要对农民进行政治动员以取得民族主义战争胜利的思想。

关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基本内容在前面已有所论述，因而不赘述。笔者将通过后面几篇文章阐释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形成。

自1925年中期开始农民运动逐渐走向高潮，“迫使甚至最面向城市的人也注意到它，以致向农民运动表示敬意，已成为共产党和（或）国民党的发言人几乎每次谈话中自动出现的套话”。^[29]《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²⁶发表于1926年9月1日，即正处于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高潮阶段。所以，毛泽东开宗名义地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他还指出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作用，“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阶级就是全靠“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压榨，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

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²⁷因此，乃知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因此，乃知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最后，他号召道：“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指出了旧社会权力的真正中心在农村才能找到，因此真正的打击也必然要打在农村。^[30]他也就提出了“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并说明了组织动员农民的基础——满足农民的需求。

然而，随着农民运动的高涨，国民党右派害怕动摇在农村的统治基础，还有斯大林主导下的共产国际要求中共维系国共合作，因而，此时中共内部又出现了防止农民运动过火，并对其进行责难的一种倾向。毛泽东针对这种责难，回到家乡湖南湘潭，于1927年1月4日-2月4日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三十二天的考察后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指出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他论述道：“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

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31]在湖南的考察使得毛泽东真正认识到了农民的革命潜力。

第二，进一步明确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32]

第三，重新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与1925年底的分析不同，此时的毛泽东采用了马列的通用概念来表述农村各个阶级，他将农村的各个阶层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并提出农民中的三种类型对于革命的观点也各别。富农对于革命持消极态度，中农则对革命怀疑从而游移，贫农是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与参与者。

第四，提出了利用农会组织农民和在农村建立农民武装的观点。他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33]的观点，并认为农民加入农会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这是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34]。与此同时，指出了农民武装的两种来源：一种就是将旧武装从地主手中夺过来变成农民的武装；另一种就是成立农民的梭镖会。^[35]

第五，强调了政治宣传在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中的作用。他写道：“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政治宣传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大的群众集会时做得很普遍。在这些集会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引动了整个农村，效力很大。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

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36]

除了上述五个方面的观点之外，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中也列举了一些其他的事项，比如从政治和经济打击地主；破除族长、神权及夫权的束缚；打破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严禁打牌、赌博及吸食鸦片；废除苛捐；开展文化活动；合作社运动及修道路、修河塘等。这些行动体现了毛泽东在农村开展政治革命的同时，也要进行社会革命的主张。因为社会革命的成功是政治革命的保障。可以说，该报告为日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正确处理农村阶级关系以及制定相关阶级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领导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到这时他已具有中国革命的重点在农村的农民的观点，并且以后从没有动摇过。^[37]

二是大革命失败后时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沉重地打击。尽管同年的8月1日，在南昌爆发了由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但是仍因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而以失败告终。基于此，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反思道：“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着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38]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会后，其本人被派往湖南组织农民秋收起义。自此，中国革命开始实现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在不久之后的湖南省委讨论暴动和土地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的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

失败。……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行动，实行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39]毛也提出了中共要独立进行农民运动的建议，他曾给中央写信：“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的旗帜已成军阀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40]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之初，起义军仍以进攻长沙、浏阳等城市为中心而损失惨重，不得不转移到江西，转战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山区，后来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联合建立和巩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道路，于是从井冈山根据地开始，在实践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主要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10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²⁷一文。在该文中毛指出了红色政权能长期存在的五个条件：第一，当前国内的政治状况是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并且新军阀之间混战，因此，红色政权可以在这种夹缝中求得生存；第二，红色政权发生在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即那些地方大都经历过民主革命的洗礼；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有利于小地方革命民众政权之长期存在；第四，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是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必要条件；²⁸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正确决策。这是在付出大革命失败的惨痛代价并接受实践检验后而提出的。毛泽东这样写道：“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

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41]

红色政权能够生存下来，毛泽东的斗争策略以及党的正确领导至关重要，这是保持红色政权长期发展的关键。当时党的特委（书记是毛泽东）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42]在这些策略的选择中，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充分意识到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必要性，此时期他主张将所有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农民，以能全部抓着农民。^[39]同时，他也提出了正规军队以及地方武装之间相互支持，用逐步扩大根据地的方式取得工农武装割据胜利的思想。²⁹

第二阶段，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1930年，毛泽东面对党内对红军前途持悲观态度的思潮，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以增强党内的信心。他如此写道：“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43]他还总结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43]这就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标志着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革命理论的基本形成。

第三阶段，毛泽东农民政治动员思想的提出。在《论持久战》（1938年5月）的演讲中，毛泽东专门论述了“抗日的政治动员”，他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

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44]“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45]毛泽东将农民政治动员视为取得革命胜利的基础条件，也标示着他农民政治动员思想的发育，而后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日趋成熟。此种政治动员的思想一直存续到 1949 年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大规模的多频次的“群众运动”就是其具体表现。

V. 结语

政治动员之于革命犹如水之于鱼。可以说，没有强大的动员体系就不可能造就成功的革命。政治革命如此，社会革命更是如此。农村政治动员的核心是处理党、军队与农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发展出一套非常现实的策略：农民大众的支持；他自己的党政机关；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一块远离国民党控制的稳固的根据地；自给自足。^[46]正是通过农村政治动员，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农村的领导力量、共产党指挥的军队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后援保障、农民则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农民的政治动员，从而获得了不竭的前进动力，同时也塑造了共产党、军队以及农民一体化的政治体系，获取强大的力量从而赢得了全国政权。

从本质上看，毛泽东的农村政治动员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内核、以民族主义为外衫的，并且通过政治鼓动、革命主体塑造以及群众路线等手段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领导。这在革命年代或许是可行的。然而，1949 年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没有及时地转向执政党，毛泽东依然采用革命年代的政治动员模式治理国家，³⁰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曲折的同时，也给中国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时至今日，政治动员的政治运作模式依然存在于中国政治生活

的一定范围内。因而，如果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就需要对革命年代遗留下来的政治动员的运作模式进行深刻反思。

注释 *

¹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村庄治理结构重构与治理效能提升研究”（项目编号：20BZZ043）的研究成果之一。

² 工作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³ 李斌：《政治动员与社会革命背景下的现代国家构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0 年第 4 期；张鸣：《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2003 年 6 月号。

⁴ 阿南友亮：『広東における中国共産党の武装闘争と動員：海陸豊，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慶應義塾大学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2009 年第 82 号。

⁵ 王萌：《政治动员视角下中共会议研究（1944-1949）——以山西潞城为例》，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3 年。

⁶ 张诺夫，徐彬：《毛泽东政治动员思想论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 年第 4 期。

⁷ 何畏，官心：《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农民政治动员策略及其现实启示》，《文化软实力》，2024 年第 2 期。

⁸ 白晓波：《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展农民运动政治动员的历史考察》，《毛泽东研究》，2020 年第 5 期。

⁹ 张肖伟，顾林元：《抗战时期毛泽东政治动员思想及现实启迪》，《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5 年第 4 期。

¹⁰ 美国学者詹姆斯·汤森和布兰特利·沃马克也持相近的观点，他们分别从利益与观念的高度重合、受苏联控制（1921—1934）、依附于共产国际、苏联模式的有效性及其意识形态等角度阐述了十月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¹¹ 中共一大的党纲是当时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帮助起草的，因而具有深深的列宁式政党的烙印。

¹² 关于中共一大后一年间的工人运动的详细情况，可以参见《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 年 6 月 30 日），载于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7～55页。

¹³ 这部分内容详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网络版）之第三章第三节《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http://www.zgdsw.org.cn/GB/218994/219014/220524/222757/222777/14961985.html>。

¹⁴ 关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在中共二大上就已经提出来，并明确区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此毛泽东只是针对1920年11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而言的。

¹⁵ 201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陈独秀勉强地接受了这个命令。他后来评论道：“只不过是第三国际的压力，中国共产党才勉强承认在国民党内开展活动的必要性。”参见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53, 60. 转引自[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23页。

¹⁶ 本文最早刊于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5年原文具体可参见网址：<http://dx.njucm.edu.cn/2016/0511/c2834a19632/page.htm>。

¹⁷ 关于此文，宣道华（斯图尔特·施拉姆）曾这样评价：毛泽东所采用的框架，与陈独秀在1923年采用的很不相同，他着重分析农民的家计是否“收支相抵”，而不是以占有土地，或雇佣劳工的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标准，来确定中国农村社会的各阶级。参见[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26页。从此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对于马克思的理解还不是很成熟。尽管如此，这是毛泽东早期对中国革命力量的全面分析，对其以后的革命策略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¹⁸ 半益农是分益农（Sharecropper）的一种。分益农是指向土地所有者交纳一定部分的收成作为地租的佃户。这种地租通常占收获物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是二分之一以上。半益农指的是要向地主缴纳一半收成的佃农。

¹⁹ 大资产阶级是在1925年原文中的表述，包括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而该文收录于《毛泽东选集》后，做了比较大的修改，表述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²⁰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http://dx.njucm.edu.cn/2016/0511/c2834a19632/page.htm>。

²¹ 此时期有中共党员沈定一在浙江萧山从事农民运动，并成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彭湃在海丰成立海丰总农会从事减租斗争；刘东轩、谢怀德在家乡湖南衡阳从事减租的斗争。

²² 关于斯大林为什么坚持中国共产党要开展工人运动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斯大林出于与托洛茨基权力斗争的需要。参见[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30～531页。

²³ 关于李大钊对毛泽东影响的论述可以参考[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特别是序言和尾声部分。而关于彭湃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论述参见[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50～367页。

²⁴ 原文可参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4～86页。

²⁵ 据毛泽东本人回忆，他从事农民运动是从1925年开始的。他曾经对埃德加·斯诺说：“在以前我还未充分了解农民中阶级斗争的程度，可是在五卅惨案以后和随之而来的政治活动的大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参见[美]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自传》，汪衡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40页。宣道华（斯图尔特·施拉姆），也持有此观点。他依据埃德加·斯诺的著作，将1925—1927年作为毛泽东的农民时期，并认为此时毛泽东确立了他的农民是革命的中心的思想。参见[美]宣道华：《1949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载于[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17页。

²⁶ 此文是《农民问题丛刊》的序言。该刊是毛泽东一九二六年五月至九月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主编的，旨在总结推广国内外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以指导和促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该文的背景就是国共合作之后，孙中山提出了扶助农工的政策，并且以李大钊、彭湃和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也着手于农民运动并获得了蓬勃发展。该文根据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八期刊印。参见<http://news.sina.com.cn/c/2006-08-31/150510885041.shtml>，2013年4月12日访问。

²⁷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问题》。该文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56页。

²⁸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它所以能存在和发展，既同当地存在着大革命时期受过革命浪潮影响的农民武装有重要关系，也不能忽视另一个因素，那就是湖南秋收起义队伍中有着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样一支正式武装，以后又有朱德率领的有着较强战斗力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上山。金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54页。

²⁹ 这些思想参见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载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7～84页。

³⁰ 有关1949年建国后政治动员式的国家治理模式的论述可参见：金野純：『中国社会と大衆動員：毛沢東時代政治権力と民衆』，御茶の水書房，2008年。

*参考文献

- [1]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51页。
- [2] 《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2年11月），载于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19～125页。
- [3] 同上注，第3页。
- [4] 同上注，第6～8页。
- [5] 同上注，第15页。
- [6] 同上注，第548～549页。
- [7]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74页。
- [8] 同注[2]，第551页。
- [9] 同上注，第579～585页。
- [10] 同上注，第593～603页。
- [11] 同上注，第583页。
- [12] 同上注，第585页。
- [13]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页。
- [14] [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译，中共

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82页。

- [15] 同上注，第261页。
- [16] 同上注，第259页。
- [17] 同上注，第261、264页。
- [18] 《告中国的农民》，《共产党》第3号，1920年12月23日。
- [19] 同注[3]。
- [20] 同注[2]，第113页。
- [21] 同上注，第124页。
- [22]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页。
- [23] 同注[14]，第261～262页。
- [24]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4～308页。
- [25] 同上注，第76页。
- [26] 同上注，第84页。
- [27] 同上注，第84～85页。
- [28] 同注[14]，第258页。
- [29] [美]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28～929页。
- [30] 同上注，第930页。
- [31]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13页。
- [32] 同上注，第15页。
- [33] 同上注，第14页。
- [34] 同上注，第23页。
- [35] 同上注，第28～29页。
- [36] 同上注，第35页。
- [37] 同注[29]，第923页。
- [38] 《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载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58页。
- [39] 《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载于《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7年10月27日。转引自金冲及：《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54页。
- [40] 《湖南致中央函》（1927年8月20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北京、长沙：中央档案馆、湖南档案馆，1984年，第115页。
- [41] 《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0页。
- [42] 同上注，第51页。

- [4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8页。
- [44]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0页。
- [45] 同上注，第513页。
- [46] [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1600~2000》，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58页。